

# 明清之際贛州的“便道”傳教鉤沉

肖承福\*

明清之際，隨着天主教自明末萬曆年間再次傳入中國以來，西方耶穌會傳教士的足跡幾乎遍佈全國，傳教活動亦由南至北日益頻繁。而江西贛州正處於當時作為南北主要交通幹線的大庾嶺通道上，為北上進京或深入內地之重要管道。本文詳列明末清初歷經贛州的“便道”傳教士及其在當地習漢語、建教堂、授洗民眾等傳教活動，分析其傳教對士大夫階層、普通民眾的影響，探討“便道”傳教形成原因，揭示“便道”傳教偶然性與必然性結合而成的獨特形式。

迨至明末，隨着西方天主教的入華，天主教開始在全國範圍內傳播。地處中部的江西境域也開始有耶穌會傳教士的足跡。由耶穌會士撰寫的在江西傳教書籍並不乏見，現當代人研究天主教在江西傳播較為系統的是梁洪生先生，他曾撰寫〈明清在華耶穌會士面向西方描述的江西〉<sup>(1)</sup>、〈明清江西天主教的傳播〉<sup>(2)</sup>等多篇論文，着眼點是天主教在江西傳播的整體概貌。張英明先生的〈17世紀西方耶穌會士傳教客家原鄉汀贛割記〉<sup>(3)</sup>，則是針對17世紀贛閩客家區域傳教活動的研究。而對於明末清初贛州天主教傳教問題，當代學者較少涉及，尤其贛州“便道”傳教現象研究則更為寥寥。因此筆者擬就此問題，做一初步研究，以求教於專家學者。

## 明末清初歷經贛州的“便道”傳教士

贛州位於江西省南部、贛江上游，章貢兩水會合之處，處於當時南北主要交通幹線的大庾嶺通道上，這使它成為明清之際耶穌會士進入京城或深入中國腹地不可逾越的地區。《贛州府志》載：“昔人謂，贛為江湖樞鍵，嶺嶠咽喉。接甌閩白粵之區，介溪谷萬山之阻……”<sup>(4)</sup>可見贛州舉足輕重的地理位置。

另外據尼古拉·斯帕塔魯《中國漫記》載：“贛州府，其商務之繁榮和稅務之豐厚完全不下於省府，而人口之眾已超過省府。”<sup>(5)</sup>耶穌會傳教士沙守信神父在致耶穌會郭弼恩神父的信中寫道：“我們從廣東省最北部的城市南雄(Nanhiung)通過陸路進入江西省最南面的城市南安(Nangan)。南安和奧爾良一樣大，非常美麗，人口眾多。從南安到贛州府，沿途都是荒涼地帶。贛州是像盧昂那樣大的城市，商業繁華，有許多的基督教徒……”<sup>(6)</sup>

以上記載說明當時贛州府不僅地理位置重要，而且其經濟地位、人口數量在全省和全國都具有不容忽視的重要影響。因此自明清之際，天主教入華，耶穌會傳教士出於各種目的，途經贛州，順便傳教即為“便道”傳教。由於至今學者仍缺乏對途經贛州“便道”傳教士作深入研究，故有必要對諸位“便道”傳教士作一系統梳理，以得出較為準確的認識。

利瑪竇(Mathieu Ricci)是16世紀第一位獲准進入中國內地和北京傳教的耶穌會傳教士。他於明萬曆十年(1582)抵華，輾轉十二年後，於萬曆二十三年(1595)借一位兵部侍郎奉召回京的機會進入江西。在從廣東肇慶前往北京的途中，所乘之舟溯贛江而上觸礁沉沒，利瑪竇在其書割中寫道：“去年(1595)，還發生了一次海難，我的一位同伴被水淹

\*肖承福，廣州暨南大學文學院歷史系中國古代史專業碩士研究生。

死了，我竭盡全力，憑藉一塊木頭脫險。”<sup>(7)</sup>因遇險而不得不在贛州逗留一段時間，此為贛州有天主教之始。

到達贛州，有傳言說封疆大吏已邀利瑪竇乘船遠遊贛州（Canceu）城。<sup>(8)</sup>此次旅行期間，利瑪竇屢次登上兵部侍郎瞿太素的船隻，而瞿太素也始終歡迎神父來訪，有時邀請他便宴。他們長時交談，雙方均感滿意，內容涉及歐洲的風俗習慣和科學進步，還涉及基督的法律。因此可以肯定，經過與利瑪竇的長時交談，時任兵部侍郎的瞿太素已經深受天主教影響。作為北京中央兵部高官瞿太素及隨同的利瑪竇，在贛州受到了盛大的歡迎。《利瑪竇中國割記》記載：“離城尚有一英里遠，三千名兵士就全副披掛，攜帶武器，旌旗飄揚地迎了上來。帶頭的統領們，在他經過時，鳴槍致敬；河道兩岸，百姓的隊伍儀仗盛大；他入城時，當地的總督和官員都來致敬。”<sup>(9)</sup>

毫無疑問，已深受天主教影響的瞿太素也必然會潛移默化地影響到其下屬的贛州官員與普通民眾。畢竟長髮碧眼的外國人初入中國，而他們的身體髮膚與中國人存在巨大差異，因此整個旅途來看望利瑪竇神父的官員和其他客人也是接連不斷。緣此機會，贛州民眾首次正式接觸到西方傳教士並且給予較好的禮待，但對天主教本身並沒有任何認識。利瑪竇本人也祇是借道贛州北上進京，並無滯留贛州傳教之意，因而影響是微乎其微的。

自1595年至1662年，先後曾有意大利人郭居靜（Lazare Cattaneo），西班牙人龐迪我（Didace de Pantoja）等，途經贛州，北上進京，協助利瑪竇處理教務。另有葡萄牙傳教士利瑪弟（Mathias de Maya）。1662年，利瑪弟被命為副教區長，巡歷中國南方諸省。由於康熙前期楊光先事件，利瑪弟藏匿在贛州，意欲留在中國繼續傳教。然有人進言，清政府將禁止天主教傳播，利瑪弟遂還澳門。<sup>(10)</sup>

由上不難看出，明末清初耶穌會傳教士祇是途經贛州，並未長久滯留傳教，其影響也是極其有限的。而真正開創贛州教區，主持贛州教務的應該是清初康熙年間的劉迪我、聶仲遷兩位神父。

## 清康熙至乾隆初期贛州的 “便道”傳教士及傳教影響

康熙禁教前，贛州的開教及創立教區成為耶穌會士在江西發展的第三個傳教基地即贛州教區，由“便道”傳教士劉迪我和聶仲遷兩位神父主持。

一、劉迪我（Jacques le Fevre）神甫，法國人，因聞羅歷山神甫<sup>(11)</sup>言“痛惜歐洲司鐸無事可作者人數頗多，而中國須待傳教師救贖者，人數何止億萬”<sup>(12)</sup>，遂請赴中國。1657年，劉迪我從澳門赴江西傳教，此後到過江蘇、北京、上海、廣東等地傳教。說明赴江西贛州並非其唯一的傳教地，也祇是“便道”傳教，真正目的是赴全國機動拓教。

劉迪我來到贛州時，正值明清鼎革之際，戰亂一度殃及耶穌會在中國內地的傳教事業。然清王朝入主中原不久，需要獲得各種社會力量的支持，故而對西方天主教也採取了懷柔政策，允許它繼續在中國傳佈。在這種政治背景下，劉迪我開始了在贛州的傳教活動。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結交地方官員。劉迪我靈活運用實踐利瑪竇、艾儒略以儒學傳教和科學傳教為中心的“文化適應性傳教策略”，採取務實謙躬的態度，廣泛結交官員紳士。到贛州後，廣交贛州上層士大夫名流如徐光啟之孫女徐驥（許母徐太夫人）、贛州巡撫佟國器<sup>(13)</sup>、贛州按察使許纘曾等。據記載：“既至贛州，巡撫佟國器待之若友，其友誼歷久不變。國器為建教堂一所，又為購置寬大駐所一處。1658年教堂落成，國器親臨，並招群官至，參加開堂典禮。先作樂開堂，禮畢聚宴。迪我時華語尚未熟習，國器乃代之宣教，首言天主教之優良，次勵群官保護，孛勸彼等入教，復刻一碑記置迪我客室中。”<sup>(14)</sup>

其次是習漢語、建教堂。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載曰：“劉迪我雖年事已長，然於中國語文進步甚速，曾集士夫三百人講說教義，並引中國古籍之文，以證天主之存在，聆其說者無一人對之持異議。”<sup>(15)</sup>

為了更好服務於傳教事業，劉迪我不斷努力學習漢語，並能夠引經據典而使無一人持異議，可以

說其漢語水準已相當成熟了。在巡撫佟國器支持下，劉迪我神甫在以贛州為中心的汀贛教區內修葺建昌<sup>(16)</sup>教堂住宅。清康熙元年(1662)，他同樣在地方官員的資助下，赴“吉安建築教堂一所”，開堂佈教。清康熙二年(1663)，劉迪我“受命為南京駐所道長”，離開贛州。至此劉迪我在傳教活動告一段落。在他努力下，贛州傳教取得良好的開局。

二、聶仲遷(Adrien Greslon)神甫，法國人。1656年抵澳門，清順治十七年(1660)，奉命進入江西不久，接替劉迪我神父主持贛州教務，時福建之汀州，江西之吉安等處傳教並隸焉。此時由於楊光先事件，全國禁教運動掀起高潮，1664年終，官吏命聶仲遷與剛抵贛州三月的瞿篤德、抵贛三日的方瑪諾二神甫離開贛州。這是聶仲遷第一次到贛州傳教，但時間短暫，因禁教不得不離開。

清康熙四年六月(1665)，聶仲遷等傳教士被押解北京，已而與諸神甫同謫廣州，被軟禁至清康熙十年(1671)謫期屆滿時止。康熙親政後，罷黜四輔臣，平反“康熙曆獄”，經過在京傳教士的斡旋，爾後被軟禁在廣州的傳教士得以重返內地各教堂，聶仲遷於1671年返回江西以後，因局勢不穩，曾居留南昌數年，但很快返回贛州。

傳教活動。據張英明、徐慶銘《17世紀西方耶穌會士傳教客家原鄉汀贛割記》載：“聶仲遷返回贛州後，長期在贛州主持教務，聶仲遷曾在贛州創辦神學院，用以培養中國人自己的耶穌會士。還參加過殷鐸澤、劉迪我等人翻譯中國儒學典籍的工作，其中《大學》譯本於1662年刊刻於江西建昌。<sup>(18)</sup>聶仲遷於第二次到贛州後一直主持教務，1691年在信豐坪石創立會口，直到1695年歿於贛州。”<sup>(19)</sup>

傳教影響。在贛州曾有一秀才，跟隨聶仲遷傳教多年，皈依了天主教，名叫夏大常(教名“瑪弟亞”)。正如李天綱先生所稱：“江西贛州的夏大常，是中國天主教史上新發現的人物。”<sup>(20)</sup>

在17世紀60年代後出現的“中國禮儀之爭”當中，江西、福建是展開“中國禮儀之爭”的中心地區，兩省天主教徒中的士紳都有人直接參與了這場爭論，為利瑪竇、艾儒略的“文化適應”政策辯護，

夏大常是其中的著名人物。他曾做過聶仲遷的中文助理，先後撰寫了〈贛州堂夏相公聖名瑪弟亞回方老爺書〉、〈生祠緣由冊〉、〈生祠故事〉、〈祭禮炮製〉、〈禮記祭制撮言〉、〈禮儀答問〉等文稿，支持在贛州傳教的耶穌會士的傳教政策和各項活動。<sup>(20)</sup>

與贛州民眾的衝突。清康熙三年(1664)，楊光先禁教事件轟動全國，震驚西方世界，全國各地掀起驅逐傳教士的高潮。此起禁教事件也迅速波及到贛州，而此時巡撫佟國器、按察使許讚曾已調離江西，贛州傳教也失去了地方護教士大夫的保護。聶仲遷事後著書稱：“吾人流謫之訊傳佈(贛州)城中，教內外來教堂者不可勝計。教內人之來，乃因此噩耗而表示憂鬱；教外人或因好奇心之驅使而來，或因辱詈吾輩而來，餘則乘機竊奪堂中諸物，竟至盜及樹木。”<sup>(21)</sup>

從以上看出受禁教事件影響，贛州民眾對教堂產生巨大衝擊。這年冬天贛州官府奉命驅逐傳教士，聶仲遷輾轉至吉安教堂，隱藏經書及堂中器物，然後前往南昌，尋找本會傳教士。直至康熙親政，這次風波才算過去。

三、17世紀末期，在贛州傳教的耶穌會士還有萬惟一(Guillaume Van der Beken)，賈嘉祿(Charles Amiani)等人。萬惟一，比利時人，1695-1697兩年間在贛州，曾任聶仲遷的助理。據耶穌會士一份〈關於中國傳教會現狀的彙報〉所說：“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萬惟一在江西省贛州不到五個月就施洗了五百人。”<sup>(22)</sup>可見萬惟一神父在贛州的傳教成果非常顯著，僅五個月就施洗五百人，祇待了兩年，便被派至淮南府，越數年歿。

賈嘉祿(Charles Amiani)，意大利人。在洪若翰神父致拉雪茲神父的信中記載：1702年，有位因公開信奉基督教而受罪的基督徒，從九江押解到他的家鄉江西省贛州後，即要求赦免他的罪行，並使他甚至在不用到庭接受官員的審訊的情況下就獲得了自由。<sup>(23)</sup>

儘管在此之前每位傳教士在贛州時間不長，但經這些“便道”傳教士努力，到17世紀末贛州仍然取得可喜成就。據徐宗澤《中國天主教傳教史概論》

載：截至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耶穌會在贛州共有神學院一所，住院一所，聖堂九所，小堂兩所，傳教士兩人。<sup>(24)</sup>另據法國傳教士沙守信在康熙三十九年(1701)，從廣州前往江西傳教，留下途經贛州的見聞，他說：贛州是像盧昂那樣大的城市，商業繁華，有許多基督教徒。<sup>(25)</sup>可見，在近一百年的時間裡，贛州教務確實有了重大發展。信仰天主教的民眾越來越多，教堂大量增加。進入18世紀後，又有一批傳教士接踵而來。

四、方紀金(Jerome Franchi)，衛方濟(François Noel)等人。方紀金，意大利人。康熙三十九年(1701)抵中國，同年到南昌練習語言。康熙四十一年(1703)方紀金遷至贛州傳教，而其在贛州的傳教成果更為突出。據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記載：“紀金遷至贛州，其初六月，為一千九百人接受告解，受洗者一百一十人。”<sup>(26)</sup>但是方紀金在贛州時間也不長，祇居二年，便於康熙四十三年(1705)被派往山東，後召入京。

【附表】明清之際贛州境內耶穌會士一覽表

序號	姓名	國籍	生卒年代	在贛州境內活動時間	備注
1	利瑪竇(Mathieu Ricci)	意大利	1552-1610	1595	北上途經
2	郭居靜(Lazare Cattaneo)	意大利	1560-1640		北上途經
3	龐迪我(Didace de Pantoja)	西班牙	1571-1618	1599	北上途經
4	利瑪弟(Mathias de Maya)	葡萄牙	1616-1670	1662	遊歷途經
5	劉迪我(Jacques Le Fevre)	法國	1610-1676	1657-1662	贛州開教創始人
6	聶仲遷(Adrien Greslon)	法國	1614-1695	1660-1665 1671-1695	任贛州教務，1691創立信豐會口
7	魯類斯(Lodovico Antonio Luca)	意大利	1655-1696	1694, 1697	在贛州發願
8	萬惟一(Guillaume Van der Beken)	比利時	1659-1702	1695-1697	聶仲遷助理
9	方瑪諾(Germain Macret)	法國	1620-1676	1664	途經
10	衛方濟(François Noel)	比利時	1651-1729	1692	途經
11	賈嘉祿(Charles Amiani)	意大利	1661-1723	1699-1701	在贛州，信豐傳教
12	方紀金(Jerome Franchi)	意大利	1667-1718	1703-1705	短暫傳教
13	沙守信(Emeric de Chavagnac)	法國	1671-1717	1702	途經贛州往返江西境內
14	駱保祿(Jean-Paul Gozani)	意大利	1647-1732	1724	隱居
15	徐茂盛(Jacques Simonelli)	意大利	1680-1755	1735, 1739	在贛州，信豐傳教

資料來源：1、[法]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全二冊)，中華書局。

2、[法]榮振華著，耿昇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全二冊)，中華書局。

五、除上述耶穌傳教士曾進入贛州“便道”傳教外，還有於康熙五十八年(1720)禁教之後到贛州的傳教士。這一時期由於曠日持久的“禮儀之爭”，康熙帝下禁教令，全國範圍內又掀起禁教高潮。不願領取“傳教印票”<sup>(27)</sup>的西方傳教士均遭驅逐，而畢登庸、賈嘉祿、駱保祿、徐茂盛等傳教士均屬此類。禁教時期，贛州成為大多數傳教士的避難所。

駱保祿(Jean-Paul Gozani)，意大利人，1694年抵華，其主要傳教區在河南開封、福建福州和興化等地。他到江西贛州是在1724年因禁教事起，謫居廣州之前，隱居於贛州若干月，時年已78歲高齡。<sup>(28)</sup>

徐茂盛(Jacques-Philippe Simonelli)，意大利人，1719年抵澳門，既而派至山東，後來禁教開始，於1725年被遣謫而赴廣州，但後來曾秘入內地。1735年在江西信豐，後至贛州，1741年返澳門。下表是對明清之際耶穌會士在贛州活動更明晰的展示。

以上諸耶穌會士都不同程度地推動了明清之際贛州天主教事業的傳播和發展，但是在贛州的時間都不長，沒有長久滯留傳教意圖，更不曾計劃建立穩定的教區，僅作短暫停留便離開，甚至有的祇是路過順便傳播教義、施洗民眾。到康熙禁教後期至雍乾時期，這種情況均未有根本改變。

### 明清之際贛州“便道”傳教原因探析

首先，康熙禁教以前，傳教士在抵達贛州之前均非以到贛州開教為目的，而是要北上進京或到其它省份開教，祇是由於困難未果，轉而至贛州，順便傳播天主教、施洗民眾，進而建立教區。正如利瑪竇在《利瑪竇中國書劄》所說：“進京目的，就是要勸化中國皇帝皈依天主教，由他發佈一道諭旨，號令天下盡歸天主。”<sup>(29)</sup>故其對任何通往北京的便道都無心滯留，更無心傳教，想方設法進入中國心臟地帶，祇因進京困難重重，不得不在沿途省份迂迴，順便傳教。

在贛州待時間最長的聶仲遷，最初來華也不是直赴贛州。祇因其他地方傳教困難重重，輾轉來到贛州，逐步開教。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中記載道：仲遷先被派到海南島，後來隨行同伴死了，就赴南雄，欲在其地新辟一傳教會，然因有困難而未果。繼而才入江西擔當贛州教務。<sup>(30)</sup>

除此之外，康熙帝禁教之前，劉迪我、萬惟一等傳教士，雖在贛州傳教有明顯成效，但時間都不過五年便即離開或是出於上級委派，或是出於困難重重，或是根本就未打算傳教，致使贛州天主教的傳播及影響，時斷時續，沒有整體連貫性。

其次，康熙帝禁教後，大多傳教士遭被謫和驅逐，途經或是躲匿在贛州，暫避風頭，因而順便權宜傳教，以期有朝一日重獲傳教自由。

據榮振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載：駱保祿曾在北京、河南等地傳教，禁教後，1724年謫居廣州，然尚得隱居贛州若干時，最後被迫而走澳門。徐茂盛也在被遣謫後，秘密入內地，1739年藏匿在贛州。<sup>(31)</sup>另據耶穌會傳教士馮秉正神父致耶

穌會某神父的信中提到：1724年9月利國安神父和被從九江教堂逐出的馬若瑟神父均在江西省會南昌府，他們在那裡祇是為了等襲當信神父的到來，三人將一起被帶往該省贛州府，在那裡與葡萄牙耶穌會士畢登庸神父會齊後再前往廣州。<sup>(32)</sup>

最後，由於中國固有的儒學文化體系，迫使傳教士要傳教得先駁偶像、闡教義，紛紛著書立說，四處奔波宣揚，從而留無定點，居無定所，祇能受命派遣、隨機流動，每到一地，順便傳教，故而“便道”傳教也就成為十分自然的事了。

王治心先生曾把清中前期耶穌會傳教士傳教事業分為三個時代，關於第一時代他指出：

第一時代，始1580年終1672年，約一世紀間，為不少漢文著述撰刻之時代。在此時代，必須駁斥偶像崇拜，說明真正教旨。(……)願欲得君主之保護，須用學術方法而獲取之。由是最初傳教士撰有數學、天文、物理之書甚多，與所撰關於宗教及辨證之書相等，或且過之。<sup>(33)</sup>

利瑪竇著述最多，有二十餘種，大多用華文寫成，如《天主實義》、《交友論》、《畸人十篇》等。郭居靜著有《靈性詣生》、《悔罪要旨》等。劉迪我著有《論中國禮儀之爭》、《欽天監事件辯護書》等書及書劄。聶仲遷著有《古聖行實》、《關於中國禮儀之紀錄》等書及信劄。此外衛方濟、方紀金、畢登庸、賈嘉祿、駱保祿、徐茂盛等傳教士均有著書。

1658年劉迪我寫有多種信劄，述其抵華及中國現狀事。嘗集士夫三百人講說教義，並引中國古籍之文，以證天主之存在。1659年去福建汀州，1662年在吉安教堂，之後，赴南京擔當駐所道長。聶仲遷寫有《一六五一至一六六九年間韃靼統治時代之中國歷史》及手抄信劄，奔走各地宣講教義。據榮振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1671年聶仲遷返江西，1689年於廣州，1691年與衛方濟在贛州，1695年歿於贛州信豐。<sup>(34)</sup>可見，聶仲遷在著書後，沒有停留在一地，而是往返於江西廣東兩省，之後順便在當地傳教，因此“便道”傳教局面就很自然地形成了。

## 結語

明清之際，隨着利瑪竇首次進入贛州以來，眾多耶穌會傳教士如郭居靜、龐迪我、劉迪我、聶仲遷等紛至踏來，歷經傳教士的竭力教務拓展，進而形成了當時僅次於南昌、饒州教區的江西第三大教區。但從最初贛州教區發展歷程來看，贛州教區的形成乃是偶然性與必然性的統一，是主觀意願的非目的性與地理區位的優越性的結合。

主觀意願上，他們最初均不是以到贛州開教為目的，而是要北上進京，或到其它省份開教，或禁教被謫，亦或受命奔走各地宣揚教義等目的，途經或短暫滯留贛州，以贛州為跳板，進能拓教，退能自保，謀求教務最優化。禁教時期，贛州成為多數傳教士的避難所和隱居地，順而秘密在此傳教；客觀成效上，雖然每位傳教士在贛州傳教時間不長，但因“便道”傳教士短時間內密集來往，卻也使得贛州教務與全國傳教形勢的聯繫日趨緊密，而且其傳教活動也十分頻繁，習漢語、寫著作、講教義、建教堂、施洗民眾等，影響不斷累加積淀，最終逐漸創立贛州教區並得到迅速拓展。到清中期，贛州的教務已經非常發達。

## 【註】

- (1) 梁洪生：〈明清在華耶穌會士面向西方描述的江西〉，《江西師範大學學報》，第36卷第1期，2003年。
- (2) 吳薇：〈明清江西天主教的傳播〉，《江西師範大學學報》，第36卷第1期，2003年。
- (3) 張英明、徐慶銘：〈17世紀西方耶穌會士傳教客家原鄉汀贛割記〉，《嘉應學院學報》，2006年，第24卷第1期。
- (4) (明)天啟《贛州府志·地理志·形勢》，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頁297。
- (5) 尼古拉·斯帕塔魯著：《中國漫記》，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2000年，頁151。
- (6) [法]杜赫德編，鄭德弟等譯：《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第1卷，鄭州：大象出版社，2001年，頁240。
- (7) 利瑪竇著，芸祺譯：《利瑪竇中國書割》，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頁14。
- (8) (9) 何高濟、李申等譯，何兆武校：《利瑪竇中國割記》，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頁279；頁279-280。
- (10) (12) (14) (15) [法]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頁293-294。
- (11) 羅歷山神甫不屬中國傳教會，僅在廣東傳教數年。曾於1623-1624年間在澳門等待機會一年半。後赴安南北圻，返還澳門兩次，附舟還歐洲。見[法]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中華書局，1995年，頁189。
- (13) 佟國器係順治正宮皇后之徒弟，康熙外祖佟圖賴之侄，為滿清貴戚之臣，崇尚天學，1655-1658年間任南贛巡撫。見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中)，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頁49。
- (16) 建昌即為明置建昌府，位於江西東部，與贛州相鄰，轄五縣，治所在今撫州南城縣。許懷林：《江西史稿》，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88年，頁440。
- (17) 張英明、徐慶銘：〈17世紀西方耶穌會士傳教客家原鄉汀贛割記〉，《嘉應學院學報》，2006年，第24卷，第1期。
- (18) [法]榮振華著，耿昇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北京：中華書局，頁292。
- (19) 李天綱：《中國禮儀之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 (20) 張英明、徐慶銘：〈17世紀西方耶穌會士傳教客家原鄉汀贛割記〉，《嘉應學院學報》，2006年，第24卷，第1期。
- (21) [法]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頁301。
- (22) [法]杜赫德著，鄭德弟等譯：《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鄭州：大象出版社，2001年，第1卷，頁234。
- (23) [法]杜赫德著，鄭德弟等譯：《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鄭州：大象出版社，第1卷，2001年，頁324。
- (24) 徐宗澤：《中國天主教傳教史概論》，上海：上海書店，1990年，頁242。
- (25) [法]杜赫德編，鄭德弟等譯：《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第1卷，鄭州：大象出版社，2001年。
- (26) [法]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頁576。
- (27) 康熙禁教時期，發給願遵守中國禮儀傳教士的憑據。凡具此憑據，可繼續在中國傳教。錢志坤：〈禮儀之爭與康熙禁教〉，《杭州師範學院學報》，2002年，第2期。
- (28) 吳薇：〈明清江西天主教的傳播〉，《江西師範大學學報》第36卷，第1期，2003年。
- (29) [意]利瑪竇著，芸祺譯：《利瑪竇中國書割》，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頁14。
- (30) [法]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頁301。
- (31) [法]榮振華著，耿昇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北京：中華書局，頁630。
- (32) [法]杜赫德編，鄭德弟等譯：《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第1卷，鄭州：大象出版社，2001年，頁340。
- (33) 王治心：《中國基督教史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頁83。
- (34) [法]榮振華著，耿昇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北京：中華書局，頁291。